

Structural Economics

结构经济学

——从结构视角看中国经济

项俊波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Structural Economics

结构经济学

——从结构视角看中国经济

项俊波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构经济学：从结构视角看中国经济/项俊波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300-10373-0

I. 结…

II. 项…

III. 结构经济学

IV. F0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6165 号

结构经济学

——从结构视角看中国经济

项俊波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20 插页 3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2 000

定 价 (精装)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子学科，结构经济学（Structural Economics）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现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我并未听到过结构经济学的提法。我所知道的只是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开山鼻祖是著名左派经济学家、拉美经济委员会主任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结构主义经济学与其说是经济学的一个子学科，不如说是强调经济的结构特征的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学派。1983 年，哈佛大学教授泰勒（Lance Taylor）出版了他的著名著作《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在书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其制度和成员的行为，使得某种特定的资源配置和演化的方式（pattern）远比其他方式更有可能出现，这个经济就具有结构。”换句话说，任何经济体都有特定的制度，其成员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政治人、社会人。经济理论不应该仅仅是由关于经济人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最大化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的解的讨论的集合。但是，泰勒并没有专门研究某一特定经济的制度与结构。《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虽然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从未进入经济学的主流。结构经济学的正式出现应该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1992 年美国纽约大学的杜钦（Faye Duchin）发表了一篇题为《工业投入—产出分析：对工业生态学启示》（Industrial Input-Output Analysis: Implications for Industrial Ecology）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指出，结构经济学是从一个经济体的具体的可观测的构成部分以及相互关系出发，对整个经济体的一种细节的、细分的描述。一个经济体的结构特征可以用形式化的数学模型描述，其中最重要的数学工具是投入—产出分析。事实上，杜

钦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以结构经济学 (Structural Economics) 为题的专著——《结构经济学：技术、生活方式和环境变化的度量》 (*Structural Economics: Measuring Change in Technology, Lifestyles, and th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8)。在这本专著中，杜钦把定性方法同以投入—产出分析和社会核算为基础的定量方法相结合，对居民生活方式、技术选择，以及两者对资源利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以结构经济学为书名的最新著作可能是荷兰蒂尔堡大学的拉 (Thijs ten Raa) 的《结构经济学》 (*Structural Economics*, Routledge, 2004)。拉认为，经济结构包含三个要素：生产者所拥有的技术、资源禀赋和居民消费偏好。结构经济学的任务是提供一种包含上述三个要素的国民核算框架，并以此为工具分析诸如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速度将产生什么影响之类的问题。拉的《结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①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散见于各类文章中的对于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讨论。例如，威廉姆斯 (Bob Williams) 提出：结构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经济体财富的存量 (资本) 和流量 (收入) 的分配不均，对作为整体的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影响。总的来看，尽管讨论经济结构问题的文献汗牛充栋，尽管“结构变化”、“结构失衡”、“结构调整”和“结构改革”是当今经济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到目前为止，正如项俊波先生所指出的，尽管结构经济理论已有了厚重的历史积累，但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结构经济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创造了 GDP 年均增长 9.8% 的奇迹。2007 年中国 GDP 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方面中

^① <http://www.infibeam.com/Books/info/Thijs-ten-Raa/Structural-Economics/0415331749.html>

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强劲，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严重。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最重要问题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可以持续？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取决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能否及时得到改善。从中国目前的经济现实出发，似乎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包含了两个主要方面：中国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增长（这也可以作为增长的质量问题），以及如何在增长过程中优化经济体系中各构成部分的比例关系。此外，在结构问题的背后还存在一系列制度经济学问题需要研究。

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GDP（或人均 GDP）的增长并不等于福利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测量应该建立在比 GDP 这一尺度更广泛的经济福利概念的基础上。并非进入 GDP 核算中的一切都能够增加国民福利。相反，创造 GDP 的经济活动可能同时导致国民福利的减少。经济活动在增加 GDP 的同时导致国民福利减少的最特殊例证就是环境污染问题。而资源的浪费则损害了未来国民福利增长的可能性。就中国而言，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大量净资本的流入，GDP 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国民福利的增长，其中的相当部分可能代表外国国民福利的增长。经济增长的目标模式是什么？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是什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将保证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最大化目标相一致？这些问题都有待中国经济学家给出答案。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就在争论社会总产值和两大部类的比例问题。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两大部类的比例失调。而两大部类的比例失调，反过来又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最终结果是国民经济几度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改革开放之后，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比例失调问题表现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失调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失调和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调。中国的投资率从1978年的38.2%上升到2007年的42.1%。同一时期消费率则从62.1%下降到49%。投资率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产能的不断上升。在消费率不断下降的条件下，增加的产能只有靠进一步提高投资率或增加出口加以吸收。前者的提高意味着产能的更进一步增加。显然，用建设更多钢铁厂来吸收过剩钢铁产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出口也难以吸收巨大的过剩产能。国际收支不平衡是中国结构失调的另一重要表现。贸易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出。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理应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消费和投资，而不是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之类的低收益金融资产。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早已经过高。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冲击充分说明，依赖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是不可持续的。

“发展是硬道理”。没有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就没有中国今天的骄人成绩。但是，已经摆脱“一穷二白”状态的中国，必须再次认真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和增长。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只有不断进行结构调整，中国才能沿着可持续增长的路径不断前行。增长目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度条件和结构条件是当前中国经济研究中的最重大课题之一。这些问题虽然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中都有所涉及，但是，似乎还没有一门经济学科将上述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项俊波先生的《结构经济学》以经济系统中的结构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规律及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是一种非常有意义

的尝试。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构经济学是项俊波先生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有益贡献。

在《结构经济学》一书中，项俊波先生对中国存在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在他看来，中国目前存在五大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金融结构失衡、区域经济结构失衡和国际收支结构失衡。项俊波先生对失衡的原因、演进和如何纠正这些不平衡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分析。我从项俊波先生的这些分析中获益匪浅。

爱因斯坦在谈到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时指出：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称基本假设、基本公设、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理论的最基本部分是那些数目上尽可能少，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概念和基本假设。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某一个经济学科的构建大致也应该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以上述学科构建的原则来衡量，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结构经济学素材，但中国结构经济学的最终确立还有待项俊波先生和其他有志于此的学者的进一步努力。

余永定

2009年2月9日

前 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日益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常态，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资源环境风险不断增加，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传统经济理论对此显得捉襟见肘，而创建结构经济学正是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内在动力，也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反映。自 2007 年 4 月爆发以来，次贷危机已经由美国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由单纯的金融危机向全面经济危机演变。虽然各国政府救市力度越来越大，但次贷危机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目前，这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未见底。看似简单的次贷危机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全球经济金融动荡？目前的解释有很多，既有过度金融创新的问题，又有激励约束机制不对称导致鼓励投机的问题，也有评级机构道德风险的问题等等。客观地讲，上述解释都从特定视角阐释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具有一定的信服力。然而，这些解释都未对次贷危机的本质根源——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根据历史经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之上。事实上，次贷危机爆发、蔓延、加深的本质根源乃是美国的过度消费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次贷危机仍是一场典型意义上的由结构失衡引发的金融危机。

众所周知，美国走的是一条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民众都弥漫着过度乐观的情绪，通过大规

模借贷维持超前消费模式。近年来，美国储蓄率不断下降，某些年份甚至还出现了负值，到 2007 年美国的总储蓄已经降到 GDP 的 14%，净储蓄降到 GDP 的 1.7%，2002—2007 年间的个人累计债务更是达到 2002 年以前 40 年的总和。为了刺激政府和普通家庭举债消费，美国必须不断增加货币发行，保持相对较低的利率。在美国经济存在结构失衡问题的情况下，这不仅会引发金融体系出现流动性过剩现象，还会刺激金融过度创新，进而导致资产价格过度膨胀与市场投机行为盛行，最终造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结构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据统计，危机爆发时，美国次级住房贷款总额约为 1.7 万亿美元，但在其基础上发行了超过 7 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 (MBS)，进而衍生出数十万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 (CDO) 和信贷违约掉期 (CDS)。实际上，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膨胀不仅成为美国资产价格泡沫的“助长剂”，而且演变成了令人担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次危机是一场由衍生品引发的、发生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批发银行危机，因此，其放大效应和杀伤力要比一般意义上的银行危机大得多。

不仅如此，为了维持过度消费、弥补国内储蓄不足，美国还必须源源不断地吸收国外储蓄，而吸收国外储蓄的方法不外乎贸易赤字与对外举债两种方式。一方面，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为新兴经济体创造庞大外部需求的同时，也使得全球贸易出现了巨大的结构性失衡。2007 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高达 8 194 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还依靠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向全球举债，这体现为全球外汇储备主要集中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而债务则集中在美国等少数发达经济体。2007 年，美国引进了约 1 万亿美元的外国资本来为其赤字融资，平均每个工作日引进 40 亿美元。事实上，出于对美元国际货币

地位的信任，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会将大量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的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其结果是，美国通过贸易赤字输出的美元，又通过金融项目盈余的形式流回美国。在这一循环过程中，美国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收益，汲取了大量外国储蓄。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强化了全球金融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由此可见，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导致国内投资储蓄结构失衡，引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失衡，而且诱发了全球性的贸易金融结构失衡，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换句话讲，随着美国借债消费经济的不断膨胀，全球经济也将变得愈发脆弱。一旦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超出了全球经济所能承受的最大范围，就必然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正因为如此，次贷这只不起眼的“蝴蝶”煽动一下翅膀，才会引发如此之大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

一些国家或地区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和日益加剧的社会风险也是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反映。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发达国家在全球市场经济规则制定中具有绝对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冲突加大。同时，在某些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也是诱发社会矛盾的根源。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拉美国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财富占有极度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等级森严，导致社会结构长期处于分化状态，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社会风险不断加剧，并诱发成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遭到严重破坏，国家出现严重的动荡局面，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近年来，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

健全。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合计占 GDP 的比例仅为 10% 左右，低于美国、法国的 16% 和 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等国 20% 左右的比例。目前，中国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 0.5 的水平，超过了 0.4 的国际警戒水平。因此，经济结构失衡导致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和风险，仍是今后需要长期关注的社会问题。

备受关注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集中体现。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为了短期利益不惜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粗放式经济发展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退化，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不断上升，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同时，随着人口的剧增，许多国家大量砍伐森林，造成森林覆盖率不断降低，加剧了土地的荒漠化和生态环境的严重倒退。此外，一些国家过度的工业化导致了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排放量急剧增加，致使酸雨现象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这将给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长期以来，中国走的实际是一条粗放式经济发展之路，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质量、低效益状况非常严重，产业结构发展失衡导致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为主的重化工业发展过快，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不合理使用导致煤炭、钢铁、石油等重要资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明显。近年来，中国虽然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但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污染物排放总量依然很大，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很多城市水、气、土壤环境污染依然十分严重，并出现向农村蔓延的态势，严重威胁基本的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由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资源和环境风险值得高度关注。

经济结构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资源环境的关系如何？结构问题为什么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这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从经济理论史的角度来看，结构理论的研究一直没有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在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时断时续地有过结构研究的痕迹，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体系。古典经济学从生产结构角度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分析基础。边际革命以后，结构分析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中消失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基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选择，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问题进行研究。但它割裂了与发达国家的有机联系，主要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和描述分析方法，难以建立一个严格的理论范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结构研究主要是运用于实证或经验分析中，比如“多国标准产业结构”等，缺乏基础理论的支撑。近年来，“结构经济学”这一名称也曾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的个别著作中，但都是基于方法论的研究，如用投入产出法来分析产业结构问题等，而非理论建树。可见，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使得经济理论在解释日新月异的经济现象和解决复杂多变的结构问题时，越来越捉襟见肘。在新的形势下，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加强了经济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紧迫性，促进了结构经济学的创建。当然，结构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创新性研究，也是国内外经济学界面临的共同任务，需要经过不懈的努力、积累和创新，使之更全面、更系统。我在高校、政府部门、中央银行及商业银行工作多年，一直注重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研究。自从2004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以来，我更有机会在一个更高、更宽的层面上观察中国经济，积累了宏观研究和政策分析的经验与知识，

并对结构经济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思考，我深感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并试图从学科创建的高度来研究这一问题。近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对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我深信它能帮助自己开阔思路和厘清理论误区，更好地分析和研究实际问题。本书的写作耗时近3年，一直不断修改和完善，其间得到了一些专家的支持与帮助，在与他们的讨论与交流中，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可以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结构经济学》是我多年来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作为一项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本书将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与政策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本书的重要特征与写作线索。

本书全面探索和创建了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可持续发展表现为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它是当前全球及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这种协调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维平衡”。本书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建了旨在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包括经济结构演进理论、经济结构失衡理论以及经济结构演进与资源环境的互动理论，这三个基本理论构成了本书的理论基础。当然，结构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理论体系，本书不可能对人类社会发展中所有的结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与论述，而是以经济系统中的结构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结构联系、内在规律性及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因此，本书是一本狭义的《结构经济学》，它有明确的研究重点、鲜明的针对性和特定研究目标，而不是纯抽象或纯理论的，它属于偏重问题导向的经济学理论分析，这是本书的显著特点。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不仅吸收了发展经济学中结构主义的理论精华，而且还吸收了制度经济学、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

展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养分，是多学科的整合与创新。可见，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具有集成性。

本书强调以中国为对象的实证分析，强调学科建设的应用价值，这是本书的立足点。站在学科建设的高度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这本身蕴藏着巨大的应用前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结构经济学实践最肥沃的土地。因此，以中国为背景创建结构经济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力得到快速释放，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同时，中国非均衡的改革与发展路径以及粗放式增长方式导致了经济结构失衡的积累和加剧。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焦点。因此，加强对经济结构演进中的失衡问题研究显得非常紧迫。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两会上答记者问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存在的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将在未来付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甚至诱发重大危机。因此，如何深入研究结构经济学理论问题，加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学术研讨，使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也是中国经济学的重大应用问题。本书在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从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等基本层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结构的演进与失衡状况，首次提出了经济结构失衡程度的测度方法，并得出了若干重要的实证结论。研究表明：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不断显现和强化，从1992年到2007年，总体上由轻度失衡逐渐演变成重度失衡，这一结论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刻。因此，从结构视角看中

国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结构经济学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与有效检验。

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是制定有效政策措施的基本前提，本书强调学术研究与政策分析的内在联系，这是本书谋篇布局的出发点，也是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归宿。本书系统分析了经济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性，并对中国经济结构演进与失衡的特点、性质、程度及其风险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估，论述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总根源在于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还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等特殊背景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它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就决定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过度依赖外部需求、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必须采取战略性的经济结构调整，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由“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集约式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三维平衡”。本书基于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全景式实证分析，提出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 and 原则。在未来不同的时点上，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路径应该在目标调节区域内寻找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最佳结合点，而这个结合点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不断趋于优化，并在资源配置上逐步实现帕累托最优。未来这些最佳结合点的集合构成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优路径，为实现这一路径，在基础理论研究、国际横向比较和把脉现实症结的基础上，本书系统提出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五大战略主张，即低碳经济型结构调整战略、消费主导型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调整战略、协调发展型区域经

济结构调整战略和管理平衡型国际收支结构调整战略，并对每一调整战略的思路、内涵、措施及内在联系进行了论述。这些政策主张的目标是化解经济结构风险，实现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内在有机统一。当前，虽然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困难和矛盾，特别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来分析，中国仍处于经济起飞和爬坡的阶段，供给相对充裕，需求也比较旺盛。全球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经济结构呈现出向高级化演进的非均衡态势，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此，只要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预期效果，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是乐观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期待本书能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也期待与国内外专家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书的研究成果仍然是探索性的，需要在深入研究和实践运用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作为一门学科，结构经济学的构建还不太成熟，真正使自己的研究能达到学科的高度，肯定还有较大的差距，需要继续努力。在理论方面，要加强从具体到一般的理论概括，实现理论创新；在实践方面，要深化结构问题的动态监测和预警研究，加强结构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不断完善结构问题研究的政策分析，在实践中不断提炼、充实和升华。我认为，结构经济学博大精深，本书只是抛砖引玉，期待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我衷心希望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推进结构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

项俊波

2009年2月1日